

【党史研究】

# 论西安事变前中共立足陕北的原因

田 猛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中央已立足陕北一年有余。究其原因,一是注意调整党内各方面关系;二是着重解决与周边地方实力派关系;三是正确发展与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帮会关系。

**关键词:**中共中央;陕北;原因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2-0088-03

## The Reasons of CCP's Holding Her Position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before Xi'an Incident

TIAN Me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Before Xi'an incident, CCP's base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The reasons can be analysed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hat CCP had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all aspects within herself; the second is that CCP had laid her emphasis on 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parties; the third is that she had appropriately develop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patriot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the unauthoritative societies.

**Key words:** CCP; the North of Shaan'xi; reasons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中央已立足陕北一年有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 一、注意调整党内各方面关系

首先,中共中央妥善解决了陕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问题。陕北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建立起来的一块根据地。1935年9~10月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根据地内进行所谓“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并实行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枉杀了党政军干部200余人,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在详细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关于肃反等问题的汇报后,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赶快释放被审查的

同志<sup>[1]</sup>。同年11月26日,中央通过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批评了陕甘晋省委在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和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sup>[2]</sup>。由于中央及时停止和纠正肃反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北根据地转危为安,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其次,中央冷静处理张国焘的错误,争取其率部北上。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率领红军左路军南下途中,公然另立党的“中央”、“中央军委”,自封党中央“主席”。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央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军委”,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在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

收稿日期:2003-02-14

作者简介:田 猛(1964-),男,陕西西安人,长安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中共党史、台湾问题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sup>[2]</sup>。同时,留在左路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等继续做张国焘的团结工作,耐心地进行争取左路军中受迷惑指战员的工作;刚从莫斯科返回国内的林育英(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向张国焘拍发电报进行帮助。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所谓第二“中央”,不久宣布北上同中央会合。这样,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部队胜利会师陕北,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革命的力量,避免党和红军的分裂。

第三,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方针政策。中央到达陕北后,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935年12月17日,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认为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为适应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1935年12月,中央通过《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强调,在“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sup>[3]</sup>新的富农政策在根据地的实施,不仅得到广大的贫苦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也使许多外逃的富农返回家园。正如1936年7月22日,《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所说:“这种改变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苏区里面已经收得实际的成效。”<sup>[3]</sup>富农政策的改变,对于缓和根据地内部的农村阶级矛盾,恢复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 二、着重解决与周边地方实力派关系

首先,调整对山西阎锡山策略。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目的是在山西建立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联接,并适时北上抗日。为了阻止红军东进,蒋介石抽调10余个师进入山西,协同晋军作战,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向陕北进攻。针对这种形势,红军挥师陕北,并发出《五·五通电》表示:“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方法。”<sup>[4]</sup>1936年5月25日,红军释放被俘的晋军第392团

团长郭登瀛,毛泽东请他送信给阎锡山,信中写到“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对付共同之公敌。”<sup>[5]</sup>尽管阎锡山没有回信,但在与中共北方局代表会谈之后,阎锡山下令取消了境内反共的组织和对陕北苏区的封锁。1936年秋,晋籍中共高级干部薄一波受北方局的委派,并受阎锡山的邀请回晋,“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利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山西新军,到西安事变前,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已基本形成。

其次,加强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关系。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十分注意处理与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早在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东北军的第57军军长董英斌,相约“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两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sup>[4]</sup>。1936年1月,中央发表《致东北军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sup>[3]</sup>同年2月,在中央与张学良直接联系之前,已同驻守陕北的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及第84师师长高桂滋等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并达成了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的口头协定。此举使得红军所急需的西药、布匹等物资从东北军防地采购回来,东北军也可以从红军的辖区得到粮食、柴草、食盐等物品。同年4月初,周恩来在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在与张学良的东北军联络的同时,中央又开展了对杨虎城的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通过在西北军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汪锋致信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又派王世英与杨虎城联络。同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令回国,被派到杨部作统战工作。王炳南帮助杨虎城分析形势,介绍中共的政策,杨虽然同意与红军建立联合战线,但还是有一些顾虑。为此,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写信与杨虎城,信中写到:“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

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sup>[5]</sup>。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西北军总参议、著名教育人士杜斌丞先生,希望他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大力斡旋”<sup>[3]</sup>,使红军和西北军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策之步骤。经过努力,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由于中共紧紧抓住“顾民族大义”、“一同抗日”这面大旗,积极主动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才很快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关系,对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三,对宁夏“二马”进行打击和争取工作。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包围,迎接红二、四方面军,打通向北与苏联、蒙古相通的国际通道,1936年5月起,红军部分主力部队在司令员彭德怀指挥下,挥戈西征,打击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封建势力。经过两个月激烈的战斗,消灭和重创了“二马”的主力部队。为了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中共中央抓住机会,适时开展争取“二马”的工作。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对回民的宣言》,主张汉回民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sup>[3]</sup>。西征战斗中,认真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尊重回族生活习惯,释放被俘人员时送礼物,搞欢送,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这样,1936年7月中旬以后,“二马”部队与红军基本处于停战状态,这对于中共中央立足陕北是有积极意义的。

### 三、正确发展与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帮会关系

首先,中共中央派人或写信与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救亡团体、国民党主战将领及地方实力派广泛联络。1936年,毛泽东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人物写信70余封,最高时一天达9封。其中,有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人的,有致抗战将领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的,有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有致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也有致蒋介石、宋子文、陈果夫等及十年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胡宗南、朱绍良等人的。这些信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崇高责任感,指出中共的统战主张“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至计”<sup>[5]</sup>;说明国共两党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sup>[5]</sup>;竭诚呼吁各方“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sup>[5]</sup>。派潘

汉年面见宋庆龄,派彭雪枫联络于学忠、阎锡山,派张金吾联络宋哲元、韩复榘,派云广英去面见李宗仁、白崇禧,王昆仑则去争取刘湘等。这对中共中央立足陕北是有很大作用的。

其次,处理好与蒙、回少数民族和哥老会的关系。早在1935年12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主张蒙汉民族共同奋斗,“彼此缔结攻守同盟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sup>[3]</sup>。蒙古人民有权利,按自主的原则建立自己的政府。1936年6~7月,西征红军打下盐池后,把国民党军阀从蒙人夺取来的盐池,无条件归还蒙古人民<sup>[6]</sup>。当然,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后,也注意从各方面处理好同回民的关系,文章前部分已有论述。正是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长城外的蒙古族及甘宁的回族,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sup>[6]</sup>。

同时,为了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6年7月初,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先后颁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因为西北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陕北革命的发展“亦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sup>[6]</sup>。哥老会成员,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要争取哥老会“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sup>[6]</sup>一致击打我们共同的敌人,取得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争取哥老会工作,对于中共中央立足陕北扩大群众基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对党内自身、周边地方实力派及少数民族与帮会组织的策略,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立足陕北,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为以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郭洪涛文集[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 [2]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六大以来(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3]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六大以来(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4]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5]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